

楼市十年论战：谁忽悠了谁

自1998年房改以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风起云涌，楼市趋势分析由于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成为一时之“显学”。

梳理有关中国楼市发展的各种焦点言论，可以发现，房改十年来，如同浮躁的房地产业本身，决策者、学者、媒体和民众，都曾陷入浮躁的认识误区。

看涨派和看跌派

“2002年将是房地产行业严冬，2月份甚至可能出现崩盘。”2001年12月25日，在央视访谈中，著名学者魏杰放言：“如果楼市不崩盘，我就去跳楼。”

2003年初，发改委研究员王小广推出了“泡沫论”。

“非典”疫情让在全国持续半年之久的“泡沫论”争论暂告平息。

2004年，“泡沫”争论再次火热。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则发出了最刺耳的声音：“这是最后的疯狂。随着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加息的不断发展，离‘最后算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仅仅是几个月，而不是一年。”

2006年5月，《论房地产市场十大谎言》一文再次让站在房价话题最前沿的王小广成为焦点。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中，王小广以个人名誉担保，5年房价必跌。

有人看跌，就有人看涨。

更引人注目的是“拐点论”。

被誉为地产界领袖的王石，2007年12月提出，楼市已经开始出现“拐点”迹象。他认为，房价上升速度超过了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连中产阶层都买不起房子了。此后王石率万科开始降价。

任志强提出相反观点：只有政策的拐点，没有房价的拐点。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也回应拐

点论会误导公众，甚至误导政府。

但是房地产市场首度出现了连续高增长后的异常：断供、退房，重点城市商品房成交量大幅减少、房地产投资增幅较大回落，60多个大中城市住宅用地流标流拍、退地。

两个男人的争斗

出人意料，多次表达“学风浮躁，在很多问题上，弄不清楚新闻娱乐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区别”的学者徐滇庆，也被卷入一场房价涨跌的赌局中。

2007年7月，徐滇庆说：“如果一年后深圳房价不涨的话，我向深圳人民道歉。”

地产博客圈的名人牛刀当即立下赌局：如果明年（2008年7月11日）深圳的房价比现在高一分钱，我一定在《深圳晚报》上用整版篇幅向深圳市民道歉。

2008年7月1日，徐滇庆在其博客上贴出文章《我向深圳人民道歉》。7月8日，徐滇庆在《南方都市报》A49版的深圳新闻版刊登了道歉广告。

然而翻看近年来的房地产新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关房价的争论俨然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战斗。而争论的白热化早使得参与双方的言论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2006年，当王小广用他的“良心和名誉”来赌5年后房价一定下跌时，另一名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立即向王小广发起挑战。

董藩在挑战书中先是懊悔前一年失去了一个和某学者就上海、北京房价下跌打赌的机会。接着又表示不想再错失发财的机会，自己在校期间附近买房，5年之后如果房价涨，王小广就赔给他这几年的价差；如果房价跌了，自己把价差补给王小广。

这边厢还没有结果时，那边厢潘石屹已和时寒冰交恶。

2007年春节期间，时寒冰的评论《潘石屹竟然如此忽悠房价》，矛头直指潘文《七大因素影响2007年房价走势》。双方由此拉开了文字大战，中途由于任志强《我替小潘说几句话》博文的发展和转变成了任时之争。争论历时1月，战场覆盖了纸媒、电视台和互联网。

谁忽悠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总经济师兼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瑾，2009年6月出版《房地产这十年》一书，首次披露了有关房价争论中几个不为人知的小插曲。

“2001年~2002年间，建设部对房地产市场的走势给予了高度关注，当年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市场调研活动。记得在北京调研时，其中一个座谈会邀请了魏杰，请他谈谈自己对房地产冬天判断的依据。魏教授介绍了自己买房的感受，说自己最近在三环周围看了一圈，没有看得中的房子。认为北京在销售的房子数量这么大，这些房子配套差、户型差、质量差，卖不出去只能炸掉。他的发言引起会场骚动，到会者议论纷纷，觉得一个经济专家，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这么事关重大的讲话，怎么仅仅会依据自己转一圈看房的经历和体会，而不作深入的市场调研和分析呢？有人当即和他展开争论，被我们及时劝止了。”

谢家瑾还透露：“2006年，按照汪光焘部长等领导的要求，我让副司长沈建忠和开发处长姜万荣尽快约谈易宪容，认真听取他的意见。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向易宪容了解他的判断是否有什么调查资料或数据，希望能提供给我们参考。但易宪容没有提出这方面的东西，而是反复说最近自己想买房，驾车沿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转悠，发现到处是工地，到处灯火通明，他就此认为房地产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泡沫。”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学会弹性生存

加拿大魁北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山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能引人注意的是它的西坡长满松、柏、女贞等树，而东坡却只有雪松。

这一奇异现象的形成是个谜，许多人不知道原因，科学界也一直没有得出满意的结论，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揭开这个谜底的，竟是一对普通夫妇。

1993年的冬天，这对夫妇的婚姻正濒于破裂的边缘，为了找回昔日的爱

情，他们打算做一次浪漫之旅，如果能找回就继续生活，否则就友好分手。

他们来到这个山谷的时候，下起了大雪，他们支起帐篷，望着满天飞舞的雪花，欣赏山谷中美丽的雪景。

后来他们发现由于特殊的风向，东坡的雪总比西坡的大且密。不一会儿，雪松上就落了厚厚的一层雪。不过当雪积到一定程度，雪松那富有弹性的枝丫就会向下弯曲，直到雪从枝上滑落。

可其它的树，如那些柏树因没有这个本领，树枝被压断，导致树林死亡。

帐篷中的妻子发现了这一景观，对丈夫说：“东坡肯定也长过杂树，只是不会弯曲才被大雪摧毁了。”丈夫点头称是。少顷，两人突然明白了什么，拥抱在一起。

生活中我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积累着终将让我们难以承受。这时候，我们需要像雪松那样弯下身来。释下重负，才能够重新挺立，避免压断的结局。

弯曲，并不是低头或失败，而是一种弹性的生存方式，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摘自《成功与激励》

《废都》当年遭禁内幕

近日，被禁16年的长篇小说《废都》获准再版，重出江湖。

1993年上半年，北京出版社推出了《废都》第一版，下半年便遭禁。16年间，《废都》也因禁而愈红，盗版从未间断，并悄然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遭禁的背后，《废都》的作者、编辑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因《废都》而提前退休的老编辑田珍颖，向记者娓娓道来。

图书出版

责编被迫提前退休

1993年上半年，《废都》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不久，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图书出版管理处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指示，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的名义查禁《废都》，对出版社罚款100万元，责编田珍颖被迫提前退休。

大概因此，对于《废都》再版，作家出版社保持了低调：“暂无宣传计划，首批印量也不多。”

据陕西媒体报道，贾平凹的文艺坛好友在得知《废都》重新出版的消息后，提议撮一顿庆祝，被贾平凹推辞掉了。大概半年前，贾平凹知道《废都》将重新出版以后，一直操心究竟能不能出来，直到北京来电话说开始铺货了，就把手机关了，不再管这个事情。

作家出版社社长助理刘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贾平凹是个很优秀的一线作者，《废都》和《浮躁》、《秦腔》构成了《贾平凹三部曲》，它们是他30年来创作的3部作品，是一次常规出版，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旧版销量

至今是出版社核心机密

当年，多家出版社争相尚在创作中的《废都》，为何北京出版社最终拿到了版权？记者费尽周折，找

到了已经退休16年的老责任编辑田珍颖。她和贾平凹是老乡，也被贾平凹敬重地称为老大姐。

《废都》是当年平凹在一个县城里写的，写作条件非常艰苦、寒冷。”田珍颖回忆，贾平凹每天只吃两顿饭而写万字，心绪、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都不好。得知贾平凹正在创作《废都》，田珍颖一直很关注，当时虽然打长途电话困难，双方还是通过电话保持着沟通。贾平凹写完之后，托陕西评论家白桦将书稿带给她。田珍颖记得那包稿件两寸多厚，是两本多杂志那么大稿纸的复印手稿，两天两夜加班看完后，田珍颖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由于《废都》出版前已受到业界追逐，各出版社派出精英强将“抢”稿，各地图书发行商则在出版社外严阵以待，一时间洛阳纸贵。当年为了能得到一本《废都》，除了书店外，全国报亭的报贩子们都在赶热潮，以能摆上一本《废都》而感到“自豪”。《废都》首印50万册，另有6家出版社以“租版型”的方式同时印刷，每家印数均逾10万册以上。贾平凹曾估算，正式和半正式出版的《废都》有100多万册，加上盗版的大约超过了1200万册。贾平凹自己搜集到的盗版版本，则超过了60个。卖了多少册一直是北京出版社的核心机密。“除了社领导知道之外，我们《十月》的编辑没有一个人知道，不许问，我们也不问。”田珍颖说，虽然被罚款，当年北京出版社并没有受到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废都》被禁

贾平凹突然“消失”

“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社会上各种反响特别大，您作为责任编辑听到的是批评多，还是肯定多？”记

者问。

“开始的时候肯定多，很多评论家都写了评论，比如雷达、白桦他们，几乎没有不回避不写。”田珍颖还清楚地记得新书出版的前盛况：“那天平凹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很多读者早就去了，排队的人很长，我们出版社的领导分秒不落地陪同，这也是我们北京出版社历史上没有过的事情。”

但是风雨来得也很迅猛。贾平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那年上半年，全国都在说《废都》，当时针对《废都》的批评有些就超出文学的范围。田珍颖记得1993年北京的那个春天还没过完，书就被禁了，“时间非常短，社会舆论一夜之间就变了，我觉得平凹还没有放下他的兴奋，就受到当头一盆冷水。”

流言四起时，贾平凹曾突然“消失”，他后来对记者称自己当年好比是“休了一个产假”，此“产假”专为《废都》而休。贾平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废都》带给他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废都》留给我的阴影影响了我整个上世纪的90年代，给我带来的是，‘誉满天下，毁满天下’。《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说成文坛最流氓的一个，流言实在可怕……”

《废都》被禁后，出版社和贾平凹合同就没有再执行下去，“作者和编辑压力都很大，谁也不可能去坚持合同，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田珍颖说，当时的状况对于作者只是一种舆论压力，但对她和出版社的同事们有行政压力，她受到行政处分，并因此而退休。但16年来，田珍颖始终和贾平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平凹不太会发短信，两人就电话联系，“我经常不接别人的电话，但是只要是我的电话，平凹随时随地都接，这一点关系，是《废都》给予我们的，是永存的。”

摘自《北方周末报》

唐德刚眼中的“历史片段”

10月26日，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唐德刚的书，如《袁氏当国》、《张学良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和《晚清七十年》等在内地有很多读者。他与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私交甚厚，从他们的口中“抢救”出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片段”。

落魄中胡适看不起病

唐德刚做的第一个口述史是胡适。两人在美国相遇的时候，胡适在美国过得“很辛苦”，失业、落魄、潦倒……虽然捧着一个博士头衔，英文也讲得非常流利，但由于不好意思开口求人，一直失业在家。

“胡适那时很清闲。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收，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胡适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熟，我会开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他连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有转折意义的两次失败

俞敏洪

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失败中寻找与把握机会的过程，没有失败就无所谓成功，没有遭遇过挫折和失败的人生是不丰富的人生，就像白开水，纯净却没有味道。一个人是否活得丰富，不能看他的年龄，而要看他生命的过程是否精彩，还要看他在体验生命的过程中能否把握住机会。

下面我来讲述对我生命有转折意义的两次失败。

第一次是我的高考。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我高考的故事，那时并没有远大的志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就是我的梦想，而高考在当时是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但是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等原因，我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才得了三十三分；第二年我又考了一

陈立夫在美国卖鸡蛋

除了胡适，唐德刚还给李宗仁、顾维钧等做过口述史。唐德刚回忆道：“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学校就行。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呢。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维钧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不懂。”

当时，国民党高官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许多人都想找唐德刚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

不过，给这些“高官”做口述史，哥伦比亚大学给的报酬可不一样。“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穷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伦比亚大学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顾维钧也

没给钱。”唐德刚回忆道。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是蒋介石的左右手，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内地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张学良大面化之

“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这个张学良是大面化之人，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

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几乎所有的主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摘自《深圳商报》

以后的两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再加上我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诸东流，一起逝去的还有我所有的积蓄。为了谋生，我到北大外面去兼课教书，因触犯北大的利益而被记过处分。

为了挽救颜面我不得不开离北大，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我找到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我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正是这些，帮助我抓住了个人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一个人可以从生命的磨难和失败中成长，正像腐朽的土壤中可以生长鲜活的植物。只有当我们能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失败和考验，我们才能成熟、收获。而那些失败和挫折，都将成为生命中的无价之宝，值得我们在记忆深处永远收藏。

摘自《新东方官方博客》

冰心与吴青：生命重叠63年间

1999年2月28日晚，吴青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妈妈去世了。”她与母亲生命重叠的63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最为深刻的变革。

一栋普通单元楼里的美好住所，窗外是法国梧桐，吴青在客厅里摆满了亲人的照片。冰心的晚年在这里度过，直至99岁。作为小女儿，吴青常常被邀请谈“冰心对我的影响”。父母赋予儿女生命，包含精神与情怀。剔除所有的身份与遭遇，在吴青心里，冰心首先是一位懂得爱与美的女性。

吴青年幼的记忆中，冰心不是一位旗袍加咖啡的太太，只有出席会议才会穿上光亮的皮鞋。冰心的爱也不在庙堂之上，对待家中的保姆就像亲人一样，吴青说，“冰心反对将人分出阶层来。”

吴青叙述了一段简短的对话。平常的一天，一位先生前来拜访，在门口见到手里拿着抹布的冰心。

“你家太太在吗？”

“先生，我就是。”

“噢，抱歉。”

至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其间知识界有一批人去到国外，冰心的旧友老舍到了美国，与她的孩子们频繁通信。有一次吴青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冰心没有过多言表，而在《老舍和孩子们》中写道：“一个10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朱德庸 把严肃藏在玩笑背后

1989年，柏林墙倒塌，互联网起飞。朱德庸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用漫画表述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他创作了关于婚姻家庭的《双响炮》系列、新新人类的《醋溜族》系列、单身女郎的《涩女郎》系列、人生况味的《什么事都在发生》、上班族的《关于上班这件事》、以及百分百非成人观点的《绝对小孩》系列，总销量超过1000万册。

20年来，朱德庸几乎成为华人

世界幽默的代名词。他的作品同时也远销到西方世界。

他用画笔描摹世人的病态与弱点，他笔下那些憨态歪歪，看上去不那么美的俗人像是我们的集体缩影——溺于消费，耽于事功，渴望获得，吝啬给予。而《什么事都在发生》则显示了他在足够的能力，跳出市井的范畴，对生命进行形而上地思考。

有人说朱德庸是把严肃藏在玩

笑背后，一直在为人生这件事发言。

事实上他本人对待自己的“发言”态度更为慎重，“幽默是现代反击无奈人生的最后一击，幽默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它不单是我作品形成的主要要素，它更是一种救赎。”

2009年，杭州市政府动工建造“朱德庸幽默博物馆”。这是华人第一座个人漫画博物馆，也是第一个以台湾漫画家命名的艺术博物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名流故事

为关心妇女权益，支持教育事业，包括捐资希望工程。如她所述，她“从浓

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冰心希望，五四精神所带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道路能够继续走下去。

在95岁寿辰时，冰心出版了《冰心全集》，把9万多元的稿费全数捐献给吴青创建的农家女学校。

作为女儿，母亲的爱进入了吴青的血脉，一切仍在继续。亲历过曲折的岁月，吴青决心致力于重建被割裂的关系。吴青作为人大代表，25年坚守，以反对票表明自己的态度，以行动维护人们的权利。吴青是最早关注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人大代表之一，曾为此事奔走多年。在北京，很大一部分外地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卖菜、做清洁工和个体小商贩，而他们的子女多在一些名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学校读书，无法享受义务教育。

作为母亲，冰心曾为吴青题写了“天地有正气，人间不夕阳”10个字，挂在她们共同居住的厅室内。这对母女并不孤独，人们回应了她们的帮助。2009年8月27日，吴青在家中接到电话，一位选民在电话里说：“谢谢你，10年了，我感觉到力量温暖和暖。”吴青时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她说：“他们以前上访，只知道喊冤；现在知道了原因，也知道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益，我想中国的未来在于这样的变化。”

数十载风云变化，不妨回头看看冰心的描述。“你看云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风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阴沉。”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